

湖湘

寻霖 刘志盛 著

湖南刻书史略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库

寻霖 刘志盛 著

湖南刻书史略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刻书史略/寻霖,刘志盛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3.1

ISBN 978-7-80761-978-9

I. ①湖… II. ①寻…②刘… III. ①印刷史—湖南省—宋代~民国 IV. ①TS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9027 号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刻书史略

作者 寻霖 刘志盛

责任编辑 马美著 许静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53.5

字 数 7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61-978-9/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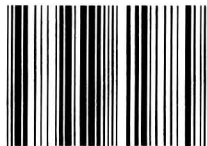
定 价 1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 电话:0731-88387860

邮编:410219

ISBN 978-7-80761-978-9



9 787807 619789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刻书及中国古籍版本等书史专著甚多，但其中很少有论及湖南者。究其原因，一则湖南古代刻书确实不如江浙等地，二则湖南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刻书史，很多史料不为人知，因而导致湖南刻书亦不为人所重。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起源于唐，成型、发展于宋。北宋时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称“天下印本以杭州为上”，其中提及杭州、四川、福建、汴京四处刻书及各自优劣。南宋时，汴京刻书衰落，但杭州、四川、福建终宋一代，皆为当时刻书中心。现存中国宋元刻本千余部，其中大部分为苏、浙、闽、川、赣所刻。

张秀民所撰《中国印刷史》是至今论述中国古代刻书较详尽且较权威的专著，其中提及宋代湖南刻书仅 15 种。今根据现存实物或诸家书目、文献记载较为准确者统计，宋代湖南刻书（不计活字、方志、族谱、递修补版及外省所刻）尚有 57 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官府刻书，且大部分又在南宋期间。数量较张著有了明显的增加，虽仍不如以上诸省，但较广东等偏远地区却多。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1922 年著）著录浙江宋元间刻本竟多达 600 种以上。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1993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著录江苏宋代刻书 138 种。王河《宋代江西刻书地考略》（《江西社会科学》1994 年 10 期）著录宋代江西刻书也在 110 种以上。宋元二代，福建书坊甚为发达，宋代仅建安余氏万卷堂刻书今尚可

知见者即多达10余种，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刻书今尚可知见者亦多达26种，则宋元福建刻书之多可想见之。黄慈博《广东宋元明经籍槧本纪略》（民国铅印）著录广东宋刻本17种，元刻本2种，明刻本92种，数量不及湖南。

宋代湖南刻书虽不丰富，但其中二事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影响甚巨。一是南宋绍熙四年（1193）庐陵周必大于潭州泥活字印所撰《玉堂杂记》一卷，虽实物不存，却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泥活字印书。二是长沙刘氏书坊自编自镌《百家词》，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词集丛书，此后明清各重要词集的收录范围及作者排序，皆大致依刘氏为准。

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迷期。元代湖南刻书人数及刻书数量都不及江、浙、闽、赣诸省，甚至不及宋代湖南刻书。如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元代刻书有63种。而湖南元代刻书今据实物或见诸文献者，仅私人5家18种，其中茶陵又居其三，尤以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所刻最多最著，共11种，今尚有存书者《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尹文子》二十卷、《说苑》二十卷、《叶石林诗话》三卷、《文选补遗》四十卷共6种。所刻《梦溪笔谈》至今为国家图书馆镇库宝之一。以仁子一人之力，刻书之多、质量之高，在当时全国都属翘楚。宋元二代茶陵成为湖南刻书中心之一，这也与该地人文较盛且毗邻刻书较兴旺的江西有一定关系。元代湖南进士143人，其中茶陵最多，计20人，其次攸县14人，浏阳13人，兴宁12人，常宁9人，醴陵7人，衡山6人，大部分为湘东之县。

明代湖南刻书较宋元二代有了显著增长，但仍不如江、浙、闽诸省。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

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明周弘祖撰《古今书刻》著录其时（嘉靖）所见各地刻书有：福建 478 种，江苏 342 种，江西 327 种，浙江 173 种，安徽 114 种，陕西 109 种，北直隶（今河北省）88 种，湖北 81 种，四川 68 种，河南 58 种，山东 52 种，广东 50 种，云南 42 种，山西 41 种。湖南 19 种，仅多于广西 9 种，贵州 8 种。

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明代刻书多达 1210 种。

明代官场间盛行以“书”、“帕”赠人之风，因此官员刻书兴盛。虽然这种“书帕本”因其简陋，历来为人所诟病，但于保存文献仍有一定积极意义。明代方志编纂与刊刻蔚然成风，官员莫不以此为政绩，光绪《湖南通志》著录明代方志有 156 种，今据史料当在 180 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已失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 16 种，而且大半为残缺之本。方志刻书成了明代湖南官府刻书之大宗。

3

今根据实物和诸家书目所载，统计明代湖南刻书（含湖南人于外省刻书，不计方志）200 种左右。除官刻本可大致确定为官员于湖南任职期间所刻外，私家刻书中很大部分亦为湖南官员于外省任职期间所刻，私刻本中真正的湖南境内刻书并不多见。

明代湖南刻书中，吉藩刻书在当时较有影响，李致忠《明代藩府刻书简表》列吉藩刻书 24 种，数量居诸藩刻书第三。吉府刻书今有实物或有目可查者尚有 8 种（不计丛书子目），所刻《二十家子书》在当时与晋藩所刻各种诗文别集、益藩所刻《茶书二十一种》并称于天下。

明代湖南书坊刻书无论史料或实物，今皆不多见。明万历四十年（1612）由福建匠人詹氏于澧州所设书坊刊行的《澧纪》为今存唯一的明代湖南书坊刻书。

清代中国刻书则以北京及江浙地区为多。

明末清初，湖南成为李张农民军、南明小朝廷、清军及吴三桂政权反复争夺的区域，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损害，更遑论刻书活动。清朝建立直至平定三藩之前，由于军事活动频仍，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思想，当时社会思潮反而相对活跃，一些明朝遗臣遗民，如王夫之、陶汝鼎、郭都贤、周星等因缅怀前朝，都刊刻了所著诗文。而这些著述至乾隆时又几乎全部被禁毁。顺、康二朝，湖南刻书虽以官刻方志为主，但私人刻书已趋活跃。乾隆朝时，刻书活动颇受文字狱的影响。乾隆朝所禁湖南先贤著述 67 种以上，其中大部分有刻本，除小部分为明末刊刻外，大半又为清初所刊。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后终乾隆一朝，湖南刻书明显减少，根据《湖南刻书年表》，每年有目可查者仅二三种，特别是乾隆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等年出现空白，尚不如之前每年刻书数量。

嘉庆以后，文网渐弛，湖南刻书数量开始上升，每年接近 10 种，道光间每年约 15 种。

宋元明以至清代早中期，湖南刻书不如江浙等地，与其时湖南人文不盛、著述不多有很大关系。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称（湖南）“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直至宋代，湖南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官员流谪之所。如唐王昌龄贬龙标，刘禹锡贬朗州，褚遂良贬潭州，元结贬道州，宋寇准贬春陵，范纯仁贬零陵等。

据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载（《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西汉出书 282 种，湖南仅 1 种；《汉书》所载士人 510 名，湖南无 1 人；西汉私家教授及五经博士湖南均无人。东汉出书 568 种，湖南仅 2 种；《后汉书》列传士人 990 人，湖南仅 4 人，

东汉私家教授 213 人，湖南仅 1 人，五经博士无；东汉三公九卿 302 人，湖南仅三公 2 人。《三国志》列传士人 625 人，湖南仅 9 人；西晋出书 649 种，湖南仅 1 种。《晋书》列传士人湖南亦仅 16 人。南朝时《宋书》、《齐书》、《梁书》列传人物，湖南分别 1 人，《陈书》2 人，《隋书》无。

唐实行科举制，唐宣宗大中四年（850）长沙刘蛻中进士，此时距前一人中进士已后 40 余年，故号称“破天荒”。北宋时福建进士 2503 人，南宋时 3482 人，居全国之首，《宋史》“道学”、“儒林”列传中福建 17 人，“文苑”8 人。《福建通志·艺文志》著录宋代福建人著述 2268 部。而宋代湖南进士仅 900 余人。两宋时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重要学派——湖湘学派，而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即湖南营道（今道县）人。湖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较前代有较大发展，但仍不及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浙一带。明代时湖南人才“駸駸始盛”（皮锡瑞语），进士题名著录 541 人，但与江浙及邻近省仍有很大差距，《明史》列传人物，江西 385 人，湖北 157 人，湖南仅 63 人。

人才决定著述，著述又为刻书提供来源。《湘人著述表》（寻霖、龚笃清著，2010 年，岳麓书社）著录 1949 年前湘人凡 8000 余人，著作 3 万余种，其中五代及以前仅 57 人，114 种；宋元二代 198 人，399 种；明代 757 人，1481 种，其余皆为清代及民国人著述。而湖南人对著述及刻书的严谨态度也影响了湖南刻书事业。《湘人著述表》著录的 3 万余种著述，其中绝大部分未曾刊刻，且至今多已失传。已刊刻部分中，由著者自身刊刻者又为少数，大部分为作者之后人、门生、乡人等所刊。这其中除有经费不继原因外，还与湖南人著述不欲轻易行世的观念有关。

清代早中期，湖南刻书不如江浙等地，也与当时、当地学风有关。清代乾嘉时期江浙考据学兴盛，因学术研究需要，考据学者必须大量掌握文献，这也就促进了江浙地区刻书、藏书事业的发展，所刻书亦以学术著述及大部头丛书居多。著名刻书家，如张之洞所谓“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除南海伍崇曜外，其余皆为乾嘉间人物。而有清一代，湖南汉学不兴，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仅列录湖南9人：王夫之、魏源、汤鹏、邹汉勋、周寿昌、王闿运、皮锡瑞、丁取忠、王先谦。除王先谦外，诸人著述虽富，刻书却不多。在湖南，除晚清长沙王先谦、叶德辉外，没有出现如金山钱熙祚守山阁、歙县鲍廷博知不足斋、曲阜孔继涵微波榭、海宁吴騫拜经楼、德州卢见曾雅雨堂、仪征阮元文选楼、大兴黄叔琳养素堂、江都秦恩复石研斋、昭文张海鹏丛善堂、吴县黄丕烈士礼居、余姚卢文弨抱经堂、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海宁蒋光煦别下斋、南海伍崇曜粤雅堂等集学术、藏书、刻书于一身的大家。除王先谦于江苏学政任内，钟谦钧、方功惠在广东任职期间，受当地风气影响，曾刊刻大部丛书外，湖南私人刻书多以己身或家人诗文著作为主，偶尔刻一些友朋、乡贤、族贤著作。与江浙刻书家大量编纂、刊刻丛书相比，湖南私人刻书内容家族化、本土化的特征相当明显。

湖南刻书不盛的状况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彻底地改变。

咸同期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传统文化及藏书、刻书活动受到严重损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全部或大部遭到损毁。太平军对“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张德贤《贼情汇纂》卷八《伪律诸条禁》）。江苏学政鲍源深疏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

佚……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尽。”以致太平天国以后，原藏书、刻书荟萃的江南、浙江地区竟出现无书可读的现象。而其时湖南仅为太平军过境之地，事后相对平静，刻书活动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而同光时期，西方先进印刷术乘虚而入，江浙地区因濒近沿海，接受西方印刷术较早，使得这些地区印书活动迅速采用新兴印刷方式，这也是清代末期湖南雕版印刷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咸同之后，湖南人才迭出，《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收录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1919年）名人1238人，其中湖南籍已占116人。湘军人物中总督级11人，巡抚级13人，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级143人。近百年来湘籍人物之盛，一直居全国之首。大批湘军人物携巨资返乡，多从事实业及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刻书事业的发展。

清代后期是湖南刻书的兴盛时期。根据《湖南刻书年表》，清同治、光绪间，湖南每年刻书都在二三十种以上。江澄波等著《江苏刻书》著录江苏清代刻书1600余种，民国刻书110余种，而清代及民国间，湖南刻书今有实物者即在4000种以上，尚不包括大量至今无法统计的书坊刻书和善书刻书。由于目前已出版有一省刻书史的省份仅江苏、福建等寥寥数省，使我们无法了解全国各省刻书概况，然就目前已有史料大致而言，湖南刻书宋元明清四代应不如江苏、浙江，宋元明三代亦不如福建、江西。清代以后湖南刻书已不让闽、赣、鄂、粤及其他各省，并在官书局刻书、私人刻书、书坊刻书等方面或多或少有所超越。

据1930年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统计：江南书局刻书62

种，江楚书局约 70 种，江苏书局 203 种，淮南书局 61 种，浙江书局约 200 种，广雅书局约 300 种，山西书局 29 种，崇文书局 238 种。所列数据其实其中一部分为代印代售者，并非皆为该书局所刻。而长沙思贤书局刻书亦近百种。思贤刻书以湘人著述为主，也刊刻一些外省人所著重要学术著述，且不以销售发卖为目的，不似湖北崇文书局大量刊刻舆地、算学、兵学等西学时务书籍以及新式教科书等大众读物。因此思贤书局虽刻书数量不及湖北崇文，但内容、校勘及刊印却优于崇文。崇文刻书虽多，但所刻书行款密集，字体扁宽，其时即为人所訾议，而思贤书局刻书因校勘认真、书品雅秀，颇受欢迎。

江凌《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博士学位论文）列举清代湖北刻书私家仅四家，而湖南却多达三十一家。清代湖南还出现了大量著述、刻书世家，如长沙芋园李氏，宁乡陶氏，湘潭周氏、张氏和罗氏，湘阴郭氏等。而新化邓氏，巴陵钟氏、方氏，长沙王氏、叶氏刻书在当时即颇有影响。1935 年叶德辉子叶启倬将德辉所刻书版共一百二十九种交由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为《郅园全书》，销售甚佳。

除邓显鹤部分刻书其经费来源于募集，图书镌刻印刷完毕后须发售部分来偿还集资，叶德辉刻书部分用于牟利外，湖南私人刻书主要用于自己收藏或馈赠友朋，并不用于发售。即使用于发售的部分，其在底本的选择、校勘的精粗、发行的动机等方面也与一般书坊刻书迥异。

清代及民国间，邵阳、长沙一直是湖南的书坊中心，而新化陈氏三味书局刻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亚于当时官书局刻书。

目前湖南图书馆所藏尚有实物存世的邵阳书坊有 20 余家，其中尤以经纶堂（80 种以上）、经元堂（50 种以上）、益元堂（50

种以上)、澹雅书局(60种以上)、富记书局(50种以上)等刻书数量最多,以澹雅书局、劝学书舍刻书质量较高。当前全国市场及民间所存古籍很大部分即为清末及民国间邵阳等地书坊所刻,其中有一些图书或版本各公藏单位也缺藏。

作为一省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长沙的书坊多出现于清代晚期。就刻书数量及规模而言,长沙书坊不及邵阳;然就书坊数量及刻书质量而言,长沙书坊则又胜邵阳。邵阳书坊以自刻自售为主,而长沙书坊除自刻、自印、自销外,还承接官府及私人图书的刊印。今湖南图书馆所藏尚有实物存世的长沙书坊有百余家,以善化章氏经济堂、湘阴蒋氏小嫖馆最为著名。

除传统的官刻、私刻、坊刻外,湖南历史上还产生了大量的书院刻书、寺观刻书及善士、善堂刻书。湖南书院刻书以书院志书、书院课艺、山长著述及教学用书为主。由于书院经费一般都较充实,书院山长又由当地宿学名儒担任,这都决定了无论内容及形式上,书院刻书在历代刻书体系中皆居上乘之列,一直是各公私藏书机构收藏的重点。而寺观及善书,或因其旁门左道,或因其印刷装帧简陋,很少为人所注目。其实清代长沙上林寺、南岳祝圣寺、衡阳大罗汉寺特别是长沙刻经处都刊刻了大量佛教经典。而同光间宁乡崔曠、周汉于长沙刊刻了大量以反西学、西教为目的的劝诫小册子,曾引起过极大的外交纠纷。

清朝末年,西方新型的印刷方式如铅印、石印、影印等传入湖南,新兴学科著述大多采用新型印刷及装帧方式。然而即使是在近代印刷术相当普及的民国时期,湖南仍有一些书坊、机构、团体和个人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情有独钟,除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外,湖南各地还有许多前朝遗老仍采用雕版印刷了大量书籍。在一些经济不甚发达的小县城及广大乡村,木活字

印刷仍广泛存在。直到解放后，中国传统印刷术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两大形式。自北宋庆历间毕昇发明泥活字后，南宋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庐陵周必大于长沙曾用此法自制泥字印刷所撰《玉堂杂咏》一书，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活字印本。元代未见有湖南活字印刷实物或文献记载。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五著录，明成化十七年（1481），户部主事乐宣曾用活字印刷宋宁远乐雷发撰《雪矶丛稿》。由于乐宣生平籍贯不可考，故无法确定是否系湖南境内所印。除泥活字外，元明清各代又出现了金属质地如锡、铜、铅及瓷质活字，但皆不如木活字盛行，而湖南境内仅发现木活字。清代湖南除各姓氏族谱绝大部分采用木活字印刷外，还出现了较多的木活字印诗文别集或专志、征信录等，其中一些字体、版印皆极精美，与版刻无异。

湖南刻书史，前人未曾论述。目前关于湖南刻书的文献极其匮乏，要从大量零散的刻书活动中，归纳总结出一部完善的湖南刻书史，必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考虑到宋元明三代，湖南刻书不多，每种皆弥足珍贵，故于正文内尽量为之介绍。清代湖南刻书丰富，故仅分类择其要予以介绍。同时将前人很少论述的书院刻书、寺观刻书、善书刻书、方志刻书、家谱印书、刻工刻价等列为专章。又根据各图书馆所藏实物及诸家书目所载明确可信者编纂《湖南刻书年表》，以系统地反映湖南刻书状况。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同时为了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些原始、完整的史料，故书中史多论少，且较多引用原文，对此敬请大家谅解并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
第二章 宋代湖南刻书	6
一、宋代湖南公私刻书	10
二、宋代湖南书坊刻书	37
三、宋代湖南地方志刻书	39
四、宋代湖南族谱刻书	47
五、宋代湖南书院刻书	50
六、宋代湖南寺观刻书	54
七、宋代湖南泥活字印书	55
八、宋代湖南刻工	57
第三章 元代湖南刻书	59
一、元代湖南私家刻书	60
二、元代湖南地方志刻书	76
三、元代湖南族谱刻书	78
第四章 明代湖南刻书	80
一、明代湖南藩府刻书	82
二、明代湖南私家刻书	87
三、明代湖南官府、官员刻书	113